

# 心净无尘 身后无产 止水无波

——追忆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吴波

本刊记者 | 张敏

从2005年2月到2015年2月，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。作为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，吴波在工作中坚持求真务实、廉洁奉公、淡泊名利，几十年从未沾染任何不洁之气；在生活中做到公私分明、勤俭节约、宽以待人，晚年两立遗嘱将房产交公，实现了“不置私产给后代”的愿望；在政治上对党无比忠诚，几次政治浪潮中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，相信党、相信群众。心净无尘，身后无产，止水无波，这就是吴波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## 坚定的政治信念

1906年，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。他幼时丧父，家境贫寒，16岁辍学到外地谋生。在上海期间，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开展地下工作。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后，西北形势严峻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吴波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先后营救出200多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。

在西安，吴波第一次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，深深折服于他非凡的气质、学识和革命理想，这使吴波下定决心要投身革命，加入共产党的队伍。1939年，吴波在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短暂工作，之后经组织安排来到延安，担任统战部传记委员会编辑一职，他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。1941年8月吴波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，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做财政工作，对吴波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。他是个外行，但勤于学习、做事仔细扎实，很快成了财政厅骨干。边区政府的财政报告、征收公粮的社论，以及毛主席研究边区财政问题的情况报告，领导都交由吴波起草。

1943年3月，延安大审干开始了。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的新党员进行政治过滤。吴波

刚到延安，又新入党，且过去的历史复杂很容易产生疑点，自然成为审查的重点对象。审查初期，吴波一度沉浸在被误解、被怀疑的愤慨之中，但他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，组织不会误判一个人。在长达两年半的审查中，吴波始终没有放弃。他坚持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、共产党有关的政策方针以及文学书籍，完成他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启蒙。吴波立志要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，做一名真正的无产者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，吴波对遭受的冤屈和挫折再没有了怨言。在之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吴波几度蒙冤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念。

“面完摩祖十年壁，换得金刚百炼身。今日灵山问证果，此生犹愧净无尘”。这是吴波1985年重返延安时写下的诗句，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、广阔胸怀和无私奉献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情操。

## 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

新中国诞生前夕，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队伍带着账本，进入北京，夜以继日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。吴波在华北财政部的副部长岗位上，研究与建立了华北的工商税收制度和公粮征收制度，经验丰富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、部党组副书记、机关党委书记，后任财政部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，主管财经政策，包括财政、粮食、物资、税收等这些“重量级”政策的研究制定。

新生的政权需要巩固，民生需要安定，财政急需筹集巨额资金，但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，收支矛盾尖锐。吴波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，也为肩上承担的使命而焦急。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原处长冯润来当时还在机要处工作，“在我记忆中，他十点前几乎没怎么休息过。有时候夜里还把我叫起来发电报，那个认真工作的劲头是没人比得了的。”

统一全国税制是新中国建立后财政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。在中财委和财政部主持下，吴波具体组织筹划召开

了首届全国税收会议。这次会议，制定了《全国税收实施要则》，起草了货物税、工商业税和其他各税暂行条例以及全国税务机关暂行组织章程，审改、发布了各种税收条例实施细则，对扭转财经困难局面，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及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。1950年，吴波主持研究起草了《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》，并在其后的几年内，由他组织起草、审改、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税法令，初步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税制度。

1952年下半年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：一是公私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国营企业的比重增加到50%以上，私营经济比例降低；二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，流通环节和征税环节相应减少，出现了经济日益繁荣，但税收却不断萎缩的局面。为此，中财委决定修正税制。在吴波的主持下，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，决定把以前应缴纳的几道税集中提前到工业环节来缴纳，最终使1953年的全国税收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。

建国初期，吴波努力完成统一财政、税收、粮食管理和经济调整工作，为奠定新中国的财政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文革结束后，吴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，任财政部部长。为了挽救当时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，他再次走上财政改革的风口浪尖。当时，由于搞“洋跃进”、农产品提价、城镇人口和职工补贴、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原因，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境。有人提出要中央财政给地方放权，给国有企业松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吴波认为，搞企业财务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，量力而行。经过调查研究，他建议中央实行了“划分收支、分级包干”的财政体制，并分别对广东、福建及深圳、汕头、珠海、厦门等四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。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，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，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### 精打细算、公私分明的模范部长

不少人觉得，财政部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，掌握国家财政收支大权，每日进出千金万银，财政部部长肯定是财大气粗，威风八面。但吴波在财政部多年，一直提倡勤俭节约，严格做到公私分明，在财政部上下有口皆碑。

1960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，机关职工蔬菜实







## 吴波同志生平

吴波同志 1906 年生于安徽省泾县。1939 年 6 月参加革命工作，任晋察冀干部大队参谋，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统战部、驻洛阳办事处干事、秘书。后奉调到延安，在中央统战部担任传记委员会编辑。1941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，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、代理局长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，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，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，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央财政办公厅主任、部党组副书记、机关党委书记，副部长、党组成员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、党组副书记，财政部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，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。“文革”期间遭受迫害。1978 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，财政部部长、党组书记，财政部顾问、党组成员。1988 年离休。

吴波同志是党的第八、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
行定量供应，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，财政部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菜，之后又栽上了葡萄树。为给这块地建围栏，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 200 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，送到吴波那里。他看后批示说：“要重新计算一下，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？”重新测量计算后发现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 20 多元，预算方案再次调整后才得到批准。有的同志认为，只相差 20 多元钱，还让行政司重新做预算，岂不是小题大做吗？吴波却认为，财政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，花钱的时候也要把钱算准算细，这是财政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。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，还是事业经费拨款，决不能大手大脚，更不能铺张浪费。

1978 年春天，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调研乡镇企业税收政策。中午吃饭时，吴波看着一桌好菜犯了难：坐下吃吧，影响不好；不吃呢，调研组这么多的同志还饿着肚子。吴波心里七上八下地勉强吃完了这顿饭，饭后让秘书给饭店付了 5 斤粮票和 50 元钱。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 3 餐付粮票 1 斤，款 1.5 元，吴波把工作组饭费都付了。

在吴波任财政部长期期间，部里没有一辆像样的好车，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，司机班的同志们心里就犯难。后来，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好车，吴波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对此做了批评，还做了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自我批评。最终，新车上缴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吴波自律性强，公私分明是他最看重的原则之一。多年来，他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，平时出门都是挤公共汽车。在财政部任职期间，因公因私他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去过一次，即使有那里的出差任务，也都避嫌让给其他人。1982 年，张劲夫从财政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吴波当时是财政部的顾问，两人是同乡。张劲夫知道他 40 年没有回过安徽，便盛情邀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。从火车站往返住地，都是省委办公厅主任派车接送的。回京前，吴波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50 元汽车费，请主任转交汽车队。他认为，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，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，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。张劲夫与人谈到这件事时，感慨地说：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，何愁党风不正，何愁执政能力不强！

1980 年，为响应中央“干部年轻化”号召，74 岁的吴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，主动给中央写报告“让贤”。冯润来回忆说，中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不到一年时间，吴波主动提出来，自己年老体衰，尤其是改革开放财政任务重，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主持财政部党组的工作。离开工作岗位后，他还主动提出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“红机”电话退回去。

吴波晚年患病，记忆力有所下降，但不能以权谋私这根弦却始终绷得紧紧的。一次，工作人员小杨的爱人到医院看望吴老，吴老误以为自己是外地出差。等小杨的爱人走后，他告诉小杨：“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。你既然带了，我也不能赶她回去。但她所有的开销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。”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至今听来仍让人泪湿双眼。

吴波主持财政部工作期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给予了高度评价，1962 年他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。

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谈到吴老的事迹时，感触颇深。“我是晚辈，没有

在吴老的领导下工作过，有时候听大家提起，都很尊敬他。吴老带来了财政部比较踏实、实事求是，不浮夸的一种精神。”

## 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

吴老在财政部工作初期住在平房宿舍里，后来分得大酱坊胡同20号的一座小四合院，一住就是47年。若今日再从财政部老楼出发，须先走三里河东路，再转月坛北街、丰盛胡同，一路向东即是大酱坊胡同。如今的胡同充满了市井气息，众多小店面把这座小院衬得愈发安静。从外面看是再普通不过的，绕成一团的电线有序地接入引出，青灰的院墙勾缝笔直，些许掉漆的红门紧闭谢客，只有越过了屋顶的树枝在寒风中伸向天空。

王沈京敲门得到许可，但走进小院里面的光景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。不是不如往昔富丽，而是不如往昔简朴。王沈京90年代曾担任吴老的秘书，对20多年前第一次来这儿报到的情形记忆犹新。“由于年久失修，低矮的院墙裂了大口子，地上铺的青砖凹凸不平，窗棂上的油漆掉得七七八八，两边厢房上甚至长了荒草。”王沈京说，“当时除了惊讶就是肃然起敬。我真没想到一位财政部长会住在这里，他管的是钱啊。”屋内的陈设也不比普通百姓家好多少。沙发是旧的，书柜是旧的，暖瓶、茶杯都是旧的。唯有一幅陈云同志的题字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，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几个大字为陋室增添了不少神采。

吴老家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铁皮浴盆，四角有“腿儿”，盆沿很高，又旧又笨，洗浴时上下很不方便。吴老年事渐高，工作人员怕他摔倒，劝他换个浴盆，可吴老就是不答应。有一次，他迈过盆沿时还是不慎摔了一下。大家又借此说起换浴盆的事，吴老仍不答应，只同意在浴盆前加了一层砖，抹了些水泥，在浴盆边的墙上安了一个扶手。

吴老的节俭作风是一贯的，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对此印象深刻。1964年“四清”运动前，干部统一在部里集训，项怀诚正好和吴老编在一组。“我那时还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办事员，常常听别人提起吴老的克己奉公，却从未见过吴老本人。集训班上，吴老随身携带的眼镜盒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眼镜盒一看就是用了许多年，表面包的绒布已经破损，边边角角都可以看到黑黝黝的铁皮。”吴老当时是高级干部，工资并不低，但他的工资经常用来资助身边的人，有时候拿回家只剩几块钱工资。“吴老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，威信很高。他在我心中永远是可亲的长者、可敬的党员。”项怀诚回忆说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北京受到严重影响，吴老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，成了危房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把沙子、水泥、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运来了，他也坚决不同意维修，僵持数天，只是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。离休后，吴老平日里除了看文件，就是在院子散散步，但地面的青砖早已破损，走起来得格外当心。好几位财政部领导去看望他时，都提过换房子的事，他却一一谢绝。吴老总是说，“我离休了，已经不工作了，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。”

## 平易近人的高级干部

吴老住的四合院有正房三间，厢房两间，南屋和车库临街，并不宽敞。吴老的司机蔡师傅一家5口人，在经济困难时不是租房住就是借房住，吴老了解情况后，执意让他们住到了南屋，水电费也都从吴老工资里交。逢年过节，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邱老给孩子们发些压岁钱。文革时期，吴老和邱老受到冲击，蔡师傅的几个儿子站出来把造反派挡在了门外，保护了二老的安全。在这座小四合院里，一边是党的高级干部，一边是普通的工人，两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几十年，那么融洽和谐。

吴老多年来严于律己，待人温和，给他当工作人员并不难。但每到逢年过节，秘书都十分苦恼。王沈京任吴老秘书的第一年春节，兴冲冲地从老干部局拎着粮油等慰问品回来，直接送到了厨房里。吴老看到后，把他叫到跟前。“吴老问我东西哪里来的，我说是单位发的，他却拿出钱来让我交给老干部局。”王沈京说，“我一再和他解释，发一些慰问品是组织对老干部的关怀。您交的钱他们不会收，收了没办法入账啊。”吴老最后说，交钱太为难的话就把东西退回去吧。王沈京一时木然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劝吴老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慰问品。以后再有类似情况，只能把东西悄悄送给老保姆，或者有困难的老乡。

吴老生活中的简朴也体现在饮食上。他吃得很清淡，炒菜只是加一点肉丝。在吴老身边工作四年多，王沈京没见他吃过一次大鱼大肉。“有时候时间太晚了，吴老留我一起吃饭。说实话，那饭菜吃起来真没什么滋味，非常清淡。”王沈京说，“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。有次在厨房帮吴老端粥，房顶的灰被蒸汽一熏，正好掉在碗里，当时我心里不是感动，而是一丝酸楚。”

吴老性格平和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架子。离休后，他常常对身边的秘书说，不要老呆在我这儿，你的工作应该在单位的案头上。秘书说，“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您服务，您这儿是‘吴办’嘛。”吴老也开玩笑地说：“吴办，

吴办，无事可办嘛。”大凡和他接触过的人，都这样评价：性格温和，平易近人，严格而不严肃，克己而不强人所难。

## 杜绝以权谋私的严父

吴老的四合院里住过司机、秘书、老保姆，却没住过太多孩子。长子吴本宁大学毕业后，主动申请去甘肃支边，吴老十分同意，“我支持你的选择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不过你既决定去，就不能当逃兵，要扎根在那里。并且不准找人动用我的社会关系。”吴本宁到了甘肃舟曲，在那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真的再没离开。而当年与他同去的另外4个高干子弟，都动用关系陆续回京了。

吴老当年在延安时，把孩子都寄养出去。三子吴威立1951年由青海来到北京。1957年他考上清华大学，吴老很高兴。“我记得当时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，需要98.4元，母亲给了100元，父亲却拦住我，硬是要回了1.6元。”吴威立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，但吴老以他没接受过基层锻炼为由，一直让他住在工厂宿舍，周末才回来一次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二老都受到冲击，吴威立这才搬回来照顾他们。吴威立所在的单位改革，在他寻找新去处时，有人想把他调到新成立的国资局，却被吴老阻拦了。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，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，最后硬是“否决”了组织的决定。

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，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小儿子吴本立，有一次得到了去香港进修的机会。吴老了解到这是一种“特殊关照”，毅然打电话让他把进修资格让给了别人。

不给组织添麻烦，不宣传自己，不让子女家属享受特殊照顾，这是王沈京总结的吴老的三个原则，而第三条原则尤其重要。吴老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，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，从他当部长到离休、去世至今，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私事，也没有一个在求职、上学、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。吴威立说：“父亲从不对我们讲大道理，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‘身教’，那就是一辈子要按照党的原则做事。”

但吴老却也挂念着儿子。吴本立在北大荒时，生活困难，曾经靠养猪改善生活。吴老得知后，每月为他寄去一定的生活费，让他专心教书。晚年，吴老也越发怜惜儿子们。过去他们离家，吴老一般只送到客厅，不再远送；老年后，每次离家回去，吴老总支撑着送到大门外……

## 两份遗嘱，两袖清风

吴老到92岁后，行动明显迟缓得厉害，住平房上厕所、洗澡很不方便。这时，万寿路财政部的宿舍正好修了

起来，财政部领导关心吴老，安排他搬到楼房去住。他最初并不去，要让给没房子的职工。但家人和工作人员反复劝他，才最终同意。吴老还反复告诉秘书，房子不能超标，家具也不能公家配，所有费用必须从他工资里出。

住到新楼房，大家都以为吴老终于踏实了，可以住得舒服些。但才住了一年多，吴老就起了立遗嘱的念头，核心内容就是房子。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请几位秘书作为立遗嘱见证人。“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，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。因此，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两单元住房。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，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。”他口述，让吴威立记录，留下了交房遗嘱，并送交财政部。当时恰逢机关事业单位最后一次房改，“我们正为房改的各种事情焦头烂额，却接到这样一份申请，内心的感触非常不一般。高风亮节，吾辈楷模。”楼继伟回忆说。

这份掷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，也由儿子、儿子的代签人签名，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但两年多后，吴老再次住院，他又放心不下了。第二份遗嘱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。遗嘱中重申：“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，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。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、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。”

拿着吴老的遗嘱，项怀诚心里明白，按照吴老的遗嘱办，就是对他最大的理解与敬重。2005年2月21日，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历程。25日上午，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。吴威立始终挂念着父亲的遗愿，下午趁家人比较齐，召集兄弟、侄儿，也请了吴老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，形成了一份详尽的《家庭会议纪要》，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。之后，吴威立又写了一份《交房申请》，请秘书送到了财政部，表示“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，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，因此也不要宣扬。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。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，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，完成他的遗愿。”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，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，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，并请其出具了收条。

吴老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，却没有大额存款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，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。平时，他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也用来帮助别人。吴波去世后，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：父亲的存款是5.1万元，母亲的存款是5.9万元。除此之外，家里几乎没有



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
吴老走后，有人对吴威立说，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，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，两套房要出售，能卖不少钱。但吴威立并没有动心，他说执行遗嘱是对父亲的最大尊重。又有人问吴威立，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？吴威立说：“我的父亲不是名人大家，就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普通干部，用今天的话说算是一名优秀的公务员。他一辈子只是为国家做了自己能做的工作，谈不上什么功劳。”

楼继伟回忆说：“吴老立遗嘱时交代，后事从简，不要宣扬。财政部没有主动宣扬，但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吴老的高风亮节一直在财政系统传颂。吴老是10年前过世的，立遗嘱是在15年前，他在任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但他的精神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，依然符合时代潮流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我们必须薪火相传，发扬光大。”

（文中部分素材来自吴老家人、同事的追忆文章，在此深表感谢）

## 采访手记：

# 一位无产者的遗产

几年前刚参加财政工作时，偶然听同事提起过吴老，只言片语的讲述让我对吴老克己奉公的精神品质敬佩不已。今年是吴老逝世十周年，我也有幸参与了与吴老家人、同事的访谈，把那些散落多年的有关吴老工作、生活的记忆碎片一一拾回，重新拼接，吴老一生坚持信念、克己奉公、求真务实、勤俭节约的历程重现眼前。

吴老8岁入私塾，16岁辍学，在旧社会颠沛流离，却从未放弃寻找新的出路。他做事极认真，头脑辨是非黑白，用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，3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之后的几十年，无论是在地区财政厅当秘书主任，还是官至财政部长，又或是被批斗下放、离休后生病住院，他始终没有背离忠诚于党、献身于党的事业、做一个无产者的初衷。吴老99岁与世长辞，最终实现了“不置私产给后代”的愿望。但他留下的两份遗嘱却是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吴老把克己奉公、勤勉认真、敢于担责的工作作风留在了财政部。他的优秀品质影响着每个与他共事的人，这些人又影响着身边人，直到内化成为一种传统，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承。

吴老把严于律己、温和待人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留给了子孙。他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向财政部伸过手，在普通的岗位上尽职尽责。今年已经80岁的三子吴威立依旧谈吐不凡，握手热情有力。他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，跑了大半个城市，还笑呵呵地说起自己坐着公交年来，享受了老年卡无需买票的优惠政策。

吴老把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廉洁风范留给了

社会。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，学习、弘扬吴老的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吴老为人一贯低调，所以，现在关于吴老的文字、影像资料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大家在他走后的回忆。我在采访和写稿中，仔细思索吴老一生的经历，他所具备的这些高贵的精神品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前半生的数次磨难和永不磨灭的希望中逐渐积累形成的。这其中的磨难，有参加革命前的迷茫，有延安大审干中的思考，还有文革时期的煎熬；这其中的希望，有初识革命队伍的欣喜，有党的信任与重用，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引，还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。

有人读完吴老的事迹，感动之余仍有些疑问，吴老克己奉公是否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？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认为，吴老交房子并不能算是不近人情。在老一辈革命者中间，便是吴老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，大有人在。“但便他这样纯粹的为数不多，令后人高山仰止。”吴威立是与吴老相处时间最长的孩子，他说：“我所了解的我的父亲，绝没有克己奉公到勉强、尴尬的境地，他坚守的理念不会为外界所动。我觉得，我们这些孩子做不到，说明我们还有缺点，还要努力提高，而不是我父亲太‘过’。”

采访时满心感动，落笔时小心翼翼，停笔后心留遗憾。遗憾时光已逝，我们讲不完吴老经历的所有故事，无法求证他做决定时的所思所想，也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真正领会他的精神品质。但有些留白也好，让人们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，静下心来体会这位纯粹的无产者留下的丰富遗产。